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1.012

章太炎论颜元

——以章太炎的《颜学》篇为中心

罗贵绒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颜元作为颜李学派的创始人,其哲学思想独具特色。自从戴望著《颜氏学记》以来,学界不乏对他思想及其学派研究之人,且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本文聚焦章太炎《颜学》篇对颜元及其思想的研究。颜元的哲学思想是奠基在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之上的,反对理学的空说与静坐,而以经世致用为主旨,倡导实行、实践和讲究功效。在《颜学》中,章太炎对颜元的这一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称其为自荀卿之后的一大儒者,但同时他也批评颜元之学“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

关键词:章太炎;颜元;批判程朱理学;六艺之学;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B24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1-0081-06

颜元,清初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也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生前其思想影响不大,逝世后其弟子李塉、王源将其思想发扬光大,但最终还是衰落了。陈登原认为颜学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然务于实,务于习,则其为学之本,未免其道太苦。孤军转战,则其学自亦不趋时宜。颜氏学之所以中衰,所以为世诟病,良以不为文墨世界、空想世界所容耳。”^{[1](P22)}况且自康熙起大兴文字狱,学人的思想受到禁锢而纷纷转向考证学,考证之风由此兴起。而颜元的思想对现实具有批判性,更不被清政权所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颜学走向衰落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直到19世纪60年代,戴望著《颜氏学记》对颜学作了比较详细系统的概括,也使得颜学得以重见天日。虽然“戴望是晚清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较力者。但其书一出,便马上受到‘正统学派’的猛烈攻击,这样就形成了晚清学界尊颜与反颜之争”。^{[2]20}

世纪20年代前后,学术界对颜学的研究再度兴起,而力倡之人当推梁启超。梁氏对颜元的人格和学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3]又因颜元极力提倡一个“习”字,且用世之心极热,所以梁氏将颜元的思想又归结为“实践主义”和“实用主义”。

民国时期,在徐世昌的倡导和主持下,创办了“四存学会”,发行了《四存月刊》,创建了四存学堂,出版了《颜氏丛书》。不管徐世昌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他所做的对颜学的研究与传播、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之后学术界对颜元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刘师培、章太炎、杜国庠、胡适、钱穆、陈登原、侯外庐、郭霁春、蔡尚思等以及后来的学者从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学术走向、思想脉络等各个方面对颜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

收稿日期:2015-01-0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4113010202)

作者简介:罗贵绒(1986-),女,湖南湘西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想、经济思想、礼仪思想等进行了研究,经过他们的不断深入的挖掘,使颜元的思想不断全面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些研究者中间不得不提章太炎对颜元的研究,因为他对颜李学派得失利弊的评价较之同时代学人颇有独到之处。梁启超、胡适都曾指出,惩阳明学之流弊,明清之际出现了反理学形上学的思潮转向,是为中国学术、思想、文化之“近代化”的开端。由此,推崇实践实用的颜李学派得到空前的重视,到了胡适那里,颜李学派更是得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精髓,成为戴震哲学的先驱,导引着中国科学时代的新哲学。而章太炎则以他对哲学思维与现代学术发展趋势的理解,指出历史上人们抨击玄学、理学是无用的空谈,是导致国家衰弱、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其实,中国的“玄言理学”并不在于“玄”,而在于“虚”,在于理论的简单粗糙和混乱。针对时贤对颜李学派的推崇,章太炎认为,学术固然出于实用的需要,然而社会领域的分化、专门学术的出现并走向理论化乃是文明发展进化的结果。颜李学派重视实践鄙弃理论,甚至鄙弃书本知识,这样的“实学”并非学术所应该具有的研究客观事物之实、实验之实、征实之实,而是“滞于有形”,不懂得作为研究客观世界之理的学术是必须进行概念抽象的,这样的“实学”与学术的发展方向是相反的,是不可以张之过甚的。^[4]

不过,章太炎对颜元的人格进行了高度赞扬。在其《颜学》篇中,章太炎称赞颜元是“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并夸赞颜元“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可谓评价甚是颇高。只是“独恨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抽象之用少”,认为“颜氏徒见中国久淹于文敝,故一切以地官为事守,而使人无窈窕旷间之地。非有他也,亦不知概念抽象则然也”。^[5]本文以章太炎的《颜学》篇为中心,来对颜元的思想进行一个简析。章氏的批评是否在理,首先需厘清颜氏的思想原貌。

二

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生于明崇祯八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由此可以看出,颜元主要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而这一时期充满了动荡与混乱。明末,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士绅结党,社会矛盾激增,土地兼并严重,无路可走的农民大众被逼起义反抗。崇祯十七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

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自裁于煤山,明王朝灭亡,此时颜元才十岁。之后关外的清军在吴三桂的配合下,挥师入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建立起清王朝。清初,统治者“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侮辱汉族人民尊严的措施,最明显的就是剃发和易服。为了在精神上取得对汉族人民的控制,清政权强迫汉人剃发,将满族人剃发的习俗推行于汉族人民,并且要求汉人穿满族服装,从而达到在精神上奴役汉族的目的”。^{[6](P16)}同时,清政权在修成的“大清律”中,明确规定了满人和汉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同时还颁布了“圈田令”,“满洲贵族以暴力强占京畿附近及山东、河南等地区的大量土地,使许多农民沦为农奴和奴隶。颜元、李塉生活在畿辅地区,家乡疆圳庐舍尽受圈于旗”。^{[7](P17)}

清入关后,满汉民族矛盾上升。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小朝廷共同反清复明;清分封的三大汉族藩王,经过发展,势力增强,割据一方,欲与清廷分庭抗礼;台湾郑氏政治军事集团也不屈就清政权。在清政权真正实现全国统一的这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兵火连天,社会的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动乱,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就连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认,顺治中叶的社会状况依旧是‘比年水旱,民不聊生’,‘吏治堕污,民生憔悴’”。^{[6](P18)}同时,清政权为了控制汉人的思想,尊程朱理学,此乃因为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功效。“康熙皇帝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使天下思想重新纳入封建专制的轨道之中。敕纂《性理精义》,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印发全国,广为传布;康熙五十一年特命朱熹配十哲之列,并礼重用朱学者儒,一时程朱理学复又兴盛。”^{[7](P7-8)}

颜元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所以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程朱理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这个时代里,颜元也是深受其影响。二十四岁时,颜元得陆王语录,喜而笃学之。二十六岁时,得见《性理大全》,认为是圣人之道,从而转宗程朱。三十四岁时,养祖母刘氏过世,颜元完全按照朱子《家礼》行事,为祖母守丧,但却差点使自己病饿而死。之后他取阅《性理》、《气质之性总论》、《为学》等,发现宋儒之言性,并非孟子本旨;宋儒之为学,也非尧、舜、周、孔之道,于是从理学的阵营中杀出,而自成一派。颜元通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建立了

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但在以政治力量为后盾的程朱理学的思想氛围下，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是有很大的生命危险的。正如陈登原所说：“清代之程朱学派，无论其上者为大狂，其下者为大伪，顾自明已还，政治上之权威自在也，科举上之功令自在也。阳明之崇陆子，自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矣，习斋之诋之其程、朱，固亦拚挡一身之祸者。”^{[1](P20)}但社会的苦难激励着颜元奋发有为，逆流而上，他以一个儒者的社会担当来谋求着救世之道，以三事三物这种复古的学术形式来重振原始儒学的经世学风。周予同先生指出：“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讲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同。”^{[8](P16)}颜元就是要回归到原始的儒家之道上来，以此批评宋明理学的虚玄，主静。

颜元的哲学思想就奠基在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之上，从“格物致知”入手指出：“按‘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窃闻未窥圣人之行者，宜证之圣人之言，未解圣人之言者，宜证诸圣人之行。但观圣门如何用工，便定‘格物’之训矣。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意，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9](P491)}在他看来，“程、朱言学……，如此断言‘闻之知之皆不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颜元认为只有“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而理学家则“默识心通”，追求“静中之明”，“静极生觉”。这在颜元看来，“‘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其实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盖无用之体，不惟为真用，并非真体也。有宋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极生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附和也”。^{[9](P69-70)}理学在颜元那个时代虽是政府支持的显学，但颜元认为理学家是静中求道，有悖孔子之道，求得的只是镜花水月而已；要获得真正的道，只有身体力行，通过手格才能获得。

在颜元看来，也只有通过实行、实践得来的道才是有效用的。而颜元最终所追求的道是要有利于

社会，具有经世济民之效。清初，黄宗羲就曾提出儒家的要义应该是“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绝不鄙弃治理财赋，……留心政事种种实际事务，不徒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开太平的纸上空谈。国家有忧，便蒙然张口，如坐云雾的腐儒，并不是真儒。真儒应该向传统儒学回归，张扬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8](P26-27)}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里，真儒的社会担当、经世济民的意识更加凸显。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真儒的社会责任。颜元作为一介儒者，继承了传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救世救民的社会担当。所以他重视实行、实践，要在实行、实践中求得利国利民的效用。而章太炎也曾指出：“一切学术的目的无非有两条，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各门具体科学的任务在于致用，而哲学的任务则在于求是。”^{[10](P48)}由此可以看出，章颜二人的相投之处。所以章太炎在《颜学》中对颜元大加赞赏，称其为自荀卿后的一大儒，这也是对颜元实行思想的肯定。

实行、实践在颜元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能从中获得可靠的知识。而心里想过、口里讲过、书上读过的都不如身上习过有效。他说：“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8](P78)}于是在他看来，讲读只是费精力而无多大功效的事。他说：“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但以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试观朱子晚年悔枝叶繁累，则礼乐未明，是在天者千古无穷之憾也。”^{[8](P78)}在颜元看来，人的精力和生命都是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生命里，人应该将精力放在实行上，从实践中获取直接的经验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才是可靠的。而理学家那样的光是格物穷理，只会如王阳明格竹子之理一样，非但没有格通竹子之理，反而使自己陷入病困之中。

而颜元之所以重视实行、实践，是因为他认为：“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尽有无穷道德，不如大家共行一道之为真也。”^{[9](P689)}这也就是说，只有实行、实践才能检验道的真理性，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空说。而空说对于社会没有什么意义，不能经世济民。这也就是说，颜元的最终目的是要经世致用，拯

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由此他肯定了功利的合理性,并以实践来作为其保障。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孟子驳‘利’字,恶乎培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9](P163)}在颜元看来,“利”本身是先儒的应有之义,而后儒特别是宋儒重义轻利,则是对儒学本质的误解,所以他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而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利”,就必须通过实行、实践,空口无凭,反而会陷入虚幻、清谈之中,对社会也不会产生什么功效,也就不能经世济民。而颜元是一个对社会、民族有着深沉的社会责任感的儒者,在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里,这种经世致用的内在驱动更加强烈。“每当社会危机激化的时刻,文人学者永远是不安定的,总是不想为某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禁锢住。即使他们已被定格于社会体制中的某一环节,仍然以其心灵深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地寻求更为合理的归宿,期望着新的突破。”^{[11](P99-100)}颜元就做着一一种新的突破。

正是因为颜元有着经世致用的社会担当意识,所以他认为:“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羞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9](P68)}既然要经世济民,那么作为儒者的颜元首先所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以孔子身体力行的“六艺”为要务。但在颜元看来,学即所用,用即所学,学在于能用,不在于记诵。他的“用”就是强调思想、言论的社会效果,指出为学不在于读解经书,而在于习行历练三事三物。颜元提倡的“六艺”之学,虽披着复古的外衣,但“他所要求研习的,不限于礼、乐、射、御、书、数。举凡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一切有用学问,他都主张研习并身体力行。从现在看,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等同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方面都涉及了,数学、书法、音乐等人类文化所必备的基础学科也包括在内了”。^{[11](P106)}由此可以看出,颜元所看重的人才“通儒”,就是能历经艰难,对天下事有着强烈责任感,能用真才实学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之人。而像宋儒那样“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一到危难之时,只能是“愧无半策匡时难,惟

余一死报君恩”。

所以颜元对理学这种“镜花水月”、“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学问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这样的理学禁锢了人的思想,也禁锢人的身体。由此颜元反对理学那种死抠书本的做法,他说:“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9](P78)}在他看来,光是读琴谱,是不会弹琴的,这只是心里想的。而只有动手弹,弹出美妙的琴声来,才是真正学会了弹琴。这也是颜元的亲身实践的体会,从习琴这个例子说明了: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操作才能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认识事物;而读书静坐是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再熟读琴谱也代替不了美妙的琴声,饼画得如何逼真,也不能充饥。

总的来看,颜元的思想是以经世致用为基调的,所以他强调实行、实践、有用。凡事都要动手“格”一番,反对静坐,死读书,“要求人们将主要精力用于习行而不是讲读;在对习行的推崇上,主张知源于行,反对从书本中求知”。^[12]所以,他的思想是一个“动”的思想,而他本人一生也是在不断地习行,倡导功利,但他所求的利不是个人的私欲,而是要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利。

三

颜元的思想是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有感而发的,由于认为宋明理学的弊端是空虚,故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实药其空”的口号,一面积极倡导实和动,一面坚决抵制虚和静,并将其视为人生追求和为学标准。^[13]对此,章太炎在《颜学》中对颜元的学术和人格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他不落程朱陆王的老套路,而以“乡三物者”、“六艺”、“兵农水火工虞”等为其学说宗旨,有别程朱的读书静坐,也有别阳明的“致良知”,别开生面。这也是其学说的独创性所在。在为人上,颜元以“苦形为艺,以纾民难;其至孝恻怆,至奔走保塞,求亡父丘墓以归”;他的教育内容也别出心裁,与“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所以章氏称其为自荀卿后的一大儒。但在盛赞的同时,章太炎也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独恨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抽象概念之用少”,认为颜元过于重视实践带来的直接的感性检验,而于抽

象理论不够重视。而章太炎本人是“重视归纳法,讲究法度概念,注重考查验证”。^{[10](P95)}他说:“凡以说者,不若以亲。自智者观之,亲亦有绌。……远视黄山气皆青,俯察海波,其白皆为苍,易位视之而变。……言必有明日者,以昨往有今,以累昨往尽有今拟之也。物故有新断,则昨或不断而今或断;言必有明日者,是犹言人必有子姓,以说不比,以亲即无征。是故主期验者,越其期验。”^[14]也就是说光靠直观的感觉而不应用理性思维,不运用逻辑推理,往往会造成错觉,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面貌,或者只能了解事物的现象,却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章氏的这一说法有其合理之处。颜元重实行、实践,不可避免将其精力过多放在对具体事物的操作上,而对理论研究则不免有所忽视。由此所得到的也就是一些直观的经验认识,而抽象概念则无处安放。有论者指出:“对于学术,中国历来缺少一种类似于西方宗教信仰狂热的虔诚激情,沉溺于整体直观的定性把握,而缺乏具体严密的逻辑分析,重了悟而不重论证,重结论而不重推理过程,重使用而不重慎密思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演绎分析。”^[15]这一不足对于颜元的学术思想同样适用。章太炎对此批评道:“算者,谱者,书者,皆符号也。……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今不课其良不良,而课其讲读不讲读,即有良书,当一切废置邪?良书废,而务水火,工虞,十世以后将各持一端以为教。”^[9]算、谱、书皆符号,也即是抽象概念。章太炎认为这些抽象概念也分好与不好,对于符合客观事实的概念应该好好应用,这样可以指导我们更有效地认识事物。^①而颜元滞于有形,抽象概念少用之,这对其学术思想的传承也是不利的。章的这一看法是深刻的,颜元逝后,虽有弟子李塨、王源等大力发扬,但还是没落了,直到戴望作《颜氏学记》,才使其思想再次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与其学说不重视抽象理论概念是有关系的。

章太炎对颜元的批评是中肯的。由于颜元学说的立旨是经世致用,注重具体的动手操作、习行,重视经验效果,而轻抽象理论,这不可避免会使其学说蒙上经验论色彩。有论者指出颜元循着凡事必亲历诸身的原则,可以对间接经验或书本知识置之不理,甚至把书本知识和传统文化都视为多余的。^{[12](P154)}为了贯彻他的思想主张,颜元本人也很少著书;专著只有《四存编》;评注类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

评》;抄录类有《礼文手钞》;散轶类有《会典大政记》、《居丧别记》、《农政要务》、《宋史评》以及大量的个人日记和少量的诗文。然而,颜元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且章太炎本人也不是一个空坐书斋论道之人,他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试图为受苦受难的旧中国寻求到一条光明大道。他的理论探寻与颜元的一样,都是时代的反映,二人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二人也都是有着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章太炎虽然批评颜不重视抽象理论,而他本人是十分重视的。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没有为中国的明天找到一条光明之路。这也说明了不管是重习行的经验性理论还是重视抽象理性的理论,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者的有效互补是必要的,但是否二者的互补就能所向无敌呢?这还有时代发展走向等一系列不为人所控制的因素在里面。这也警示着后人,认识要不断深入,实践也要不断深入,要站在一代又一代的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注 释:

① 关于章太炎的学术是致用还是求真,以及他如何认识学术之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已有学者对此做过研究。侯外庐指出:章太炎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也不是乾嘉学者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他认为章太炎能将致用与求是相统一,既反对附会又不墨守,既重实验又论理要,但所论过于笼统。陈平原认为章太炎以真俗之别、理器之辨来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注重学术的独立价值及其高于任何致用领域的深远影响,他的观点是“治世必须借重学术;求学则不必讲求致用。求是之学为无用之用”。江涓认为章太炎一方面超越了兼知行而言之、以成德经世为旨趣的儒学式学术观念,另一方面又突破了现代学术以求真求是为职志而独立于致用的教义。参见江涓:《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参考文献:

- [1]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 [2] 陈山榜.颜元评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
-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88.
- [4] 江涓.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7-120.

- [5] 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罗志田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2-74.
- [6] 王春阳.颜李学的形成与传播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
- [7] 姜广辉.颜李学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8] 颜元.习斋四存编[M].陈居渊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9] 颜元.颜元集[M].王星贤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 [10] 何成轩.章炳麟的哲学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 [11] 朱义禄.颜元、李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2] 魏义霞.习行之实与讲读之虚:颜元读书观透视[J].文化学刊,2013,(1):148-155.
- [13] 魏义霞.平等与启蒙:从明清之际到五四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
- [14] 章太炎.章太炎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187-189.
- [15] 程伟礼.经世致用与当代中国文化矛盾[J].复旦学报,1990,(3):42-51.

(责任编辑:许桃芳)

Zhang Taiyan's Discussion of Yan Yuan's Thoughts —In Terms of Yan Xue

LUO Gui-r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Yan Yuan's thoughts are very distinctive as the founder of the school of Yan-Li.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studied Yan Yuan's thoughts and the school of Yan-Li since Dai Wang's Yan-shi Xue Ji was published. The article pays attention to Zhang Taiyan's Yan Xue which studies Yan Yuan's thoughts. Yan Yuan's thoughts are established at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ism to Cheng-ZhuLi School, and he opposes talking without doing of Cheng-ZhuLi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Yan Yuan advocates that administration and pragmatism and encourages people to practice not talk. Zhang Taiyan spoke highly of the theory of YanYuan's administration and pragmatism and praised him as a great Confucian since Xunzi. However, Zhang Taiyan criticized that Yan Yuan's thoughts lacked of abstract conception so that his thoughts declined.

Key words: Zhang Taiyan; Yan Yuan; criticism to Cheng-Zhu Li School;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dministration and pragmatism